

白首玉

谷 峪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是描写故城县副县长白方玉回乡办社的故事。当党提出“加强农业战线”的号召时，共产党员白方玉同志第一个响应党的号召，回乡领导社员勤俭办社。带动社员打井、积肥、搞生产；批判了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发挥了全体社员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使农业社进一步巩固。作者根据这一动人的事迹，用散文形式，生动地描绘出一个：能上能下，既能当干部，又能当农民的党员形象。



白 方 玉

谷 峪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保定市裕华东路）

河北省书刊营业许可证第三号

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河北分店发行



1958年4月第一版 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32 · 3/4 印张 · 18,000字

印数：1—3,000册 定价：(6) 0.09元

统一书号：T 10086 · 113

白方玉

一

走到自家村村头，不由得我的脚步停下来，长时间地望着这个村庄，我的心激动地跳着。

自家村已往留给我的印象不是这样。是一个穷苦、破旧的土窝窝；村边上光秃秃，村南的干河底上泛起厚厚的雪白碱霜。一九四二年初夏，我们独一团和日本鬼子在这里遭遇，激战整整一天，部队和老百姓一起打退了敌人六次冲锋。那正是“五一”扫荡后鬼子猖獗的日子，敌人增援很快，我们不得不在大量杀伤敌人以后趁着晚上突围。记得村周围的树被削断了，村边上的房屋被击倒了……

十五年的变化是这样大：干河底被人们耕种起来，村周围年轻的果树长成了大身量，齐整的房屋掩藏在春花的深处……随后我忽然悟到，连我自己也是变化的：十五年前我是一名八路军，手持着一枝马枪在这村头站岗，而现在我是一个党报的记者，刻下身上带的却是一支笔了。环境改变着人们，人们创造着环境，在深思中怎能不使人感慨呢！

我这次的到来，是访问白方玉的。他原是故城县副县长、中共故城县委委员，今春他向省委申请，经批准回村办高级社来了。我的任务是把它的精神介绍给我们广大的人民。

我向村中走去，村边上很靜，沒有一個人。池塘边上几块洗衣石冷落地躺著，是一个春忙时节的农村景色。

从一个在街上搗糞的老人嘴里，打听到白方玉住在小学的后身。我便向老人指示的方向走去了。

“白方玉同志在嗎？”走到院里，向坐在灶前燒飯的妇女問了一声。

“啊，他沒有在。請屋里坐，我去找他。”妇女站起来热情地說。

我暗自判定：她一定是方玉的妻子——白大嫂。她和我認識的其他干部家屬一样，当有陌生人找丈夫来的时候，是那样热情和高兴，而且高兴、热情还是不愿让人看出来。

我进了她的屋，她从竹皮暖壶里給我倒上一碗水，問了我从哪里来，姓什么叫什么就出去找白方玉去了。她說：“那你就一个人給看会兒門吧，我去找他。”

这时，我独自一人溫习着在省委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白方玉是一九四二年冬天脫产参加抗日工作的。那时是“五一”扫蕩以后。在慘酷的扫蕩中，有許多好干部牺牲了，也有一部分不坚定的人妥協了，我們根据地的工作，被摧殘得七零八落。党为了健全各級組織，开展工作、坚持抗战，大力号召有能力的村中党员、干部走出家庭，到光荣的崗位上去！白方玉就是响应了党的号召，由村农会主任脫产去任区財經助理員的。他离家的日子，是我們和敌人在这村作战以后不久，村中房子被鬼子燒的燒啦，耕牛拉走的拉走啦，人被抓啦，敌人是最驚張的时候，抗日的火焰是暂时低落的时候，白方玉响应了号召，离开了家。他提起小包离家走的那天，是他的妻生下第一个兒子不滿三天的时候；家里沒有人手还没有吃喝。白方玉，先到姑姑家背来五升米，又把丈母

娘接来，然后对妻說：“素英呵，我走啦，城边上几个資敌村的工作正等我呢。你是个共产党员，哭哭啼啼的可不好。有什么困难找支書帮助，沒了吃的找村中同志借点。”

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的家。

十五年中，他不知疲倦地为人民做了許多工作。他自己虽沒有計算过，但人民全都記得。

前年在全国範圍內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全村全县全省都高級化了。去年春节时，他为了和家人和乡亲们团聚、庆賀，他回家过了一个“年”。因为几年不在本县工作、不回家，所以家乡的情况不甚了解。通过几天和群众、干部接触，他发现了一些問題。也許是他对自己的家乡和人民有历史的了解，所以問題反映的直接、認識的明快。他認為农村問題基本上是个干部問題。几年来国家事业的发展，强有力的干部抽調走了，所剩的新干部年紀輕，老干部又多是沒有文化的；合作化这样一个新的生产組織形式到来之后，一切关系正在变化，在处理这些变化中的問題的时候，显然干部力量达不到。

他从家中回到他的工作崗位上以后，立刻有了許多感触：他觉得一个县里四五个县长，一个科里又是两三个科长……这些干部虽然每天都是忙的，可是适当抽一些到基层去工作也决不会受到影响。现在紧要的需要干部的是合作社，正象“五一”扫蕩以后迫切需要干部的是区、县一样。这时他的脑子里就有了到村办社的愿望。但是这个愿望他还不知道是不是健康的，因此沒有敢說，一直藏在心里。

今年新年以后，地委傳達了中央“关于干部問題”的报告，其中主要精神是精簡机构，干部下放。他开始肯定自己的愿望是对头的。他当天晚上給省委第一書記写了一封信。

信上前几句是这样：

“……我应当首先说明，我的工作积极的，和县委各委员之间也是团结的……”

两天之后，地委书记用电话通知他：他的请求省委批准了，地委也同意，省委对他的精神做了表扬。白方玉兴奋的一夜都没有睡觉。他的思想、感情早飞到家乡去了。他好象已经不是睡在床上，而是睡在田野的树荫之下或是牛棚旁散发着草料香的小屋子的土炕上。

我见到过，也体会过，在村村响着枪炮声和遍地滚着烟火的抗战最艰苦的年月里，丢下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子而走出家庭是需要勇气的；但在今天，在和平的日子，抛开桌前的表报和文件走出县长办公室而回到村办社、参加体力劳动，是同样需要勇气的。据我看，后者所需要的勇气比前者甚至要大些才能做到。

我自己端着水碗正这样沉溺地感想着，一个青年妇女悄悄走来，见屋子里仅有一个陌生人，就抽头走去。她中断了我的感想以后，来到院子里；看着他的房舍和院落。

一般说来，工作干部的家中房舍稍微破旧一些，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缺少劳动力。就是村中兄弟爷儿们不厌帮忙，自己也不是处处都高兴麻烦人的。白方玉的家里也不外乎这个规律。三间土坯北屋檐椽向下垂了，墙头由于历年雨水的冲刷出现了许多沟壑。然而它给人不是荒凉的感觉，看得出它是有人修补的；不过工匠的手艺不大高明罢了。这种工匠，我猜是妻子和较大的孩子充当的。

不大一会，白大嫂回来，手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姑娘，进门便说：“找不到他，会计那里没有，窑上也沒有。”她的额角上挂着汗珠，她路上走的一定是很快的。我向小姑娘

招招手，白大嫂又說：“去，和叔叔認識認識。”

我把她攏在怀里，她竟摟着脖子撒起嬌來。

我問：“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白方玉。”小嘴說的很快，字又咬得很准。

从小姑娘嘴里还了解到，她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以及他們的名字。她是排行老五，名字叫白鳳娥兒。

白大嫂重又坐在灶台前边以后，不大的工夫就把三間屋子廋成烟洞一样了。因为燒烟煤，风箱不赶勁，火苗总冒不上來。她的两眼被烟熏得流着热泪。这时我才发现：火是重生起來的，剛才生起的火早在她出去找丈夫的当兒自熄自灭了。

我見她燒煤火不熟練，問了她之后才知道从今年她們才演習着燒煤的。等她費了好大力气把火生旺以后，鳳娥的两个哥哥放学回来。沒有等得进屋就脫光了膀子，向媽媽要夾衣服。媽媽不敢再离开那堆火，只得劝說着他們——暫且把脫下的棉衣放下来，做好飯以后媽媽再从柜里給他們找。

二

中午，白方玉回来了。也許他已經听到人說家中有人等他，一直走到屋來和我親切地握手：

“坐汽車來的嗎？”他問。

“不，汽車路在修。坐的‘二等’車。”我說。

他听我說坐的“二等”車，很是驚訝，上下打量着我，笑眯眯地不住微微搖頭。我懂了他的意思，便向他解釋：

“是呀，当初他們不敢馱的；見我个子高，分量大，我到了那里車工們就偷偷溜掉了。我說‘多加五十斤行李費吧’，人家也不敢馱，都推脫說‘自行車子軟’。后来我无意中說出是到你这里來的，这才有了抱奋勇的。”

說到这里，我們两个人都笑起来。

我把介紹信遞到他手里，他站在我的对面看。我打量他是一个上中流个子，胖墩墩的，圓圓的臉，健康的皮肤；在我們的家乡农民形容这样的人叫“車軸汉兒”。一看就觉得他的渾身各处都是力量。

在他看信的时候，他的小女兒鳳娥兒，从炕上扑过来扒住他的脖子，再三的打攪說：

“爸爸，社里病了一个牛！”

白方玉听了女兒的話显然不高兴，就把她推开：“知道啦，知道啦。”

“大牛病啦，誰拉車？”鳳娥兒仍在追問。

他只可无可奈何地应付着：“我拉我拉。”

“你拉的动嗎？爸爸，你一个人？”

爸爸轉回头来，看見她便气得笑了：“我一个人拉不动，大家伙拉！”

“我，爸爸？”

“你也拉。”

小姑娘这才滿意地笑着躲起来了。

“好哇，”他低声說；然后把信紙送回信封里，“在这里多住几天吧，帮帮忙。眼前看，村上的空气变好了，一些社員的情緒稳住了。最乱的是春节以后，有几家上中农把驢子往家一牵，要求退社。这时候有一些人，也多是中农心里就跟着搖摆起来。应当承認我們干部在工作上有一些缺点，这些缺点被他們几家养驢子戶抓住不放——講条件，叫长短。前些日子，党内、团内、积极分子們开了一系列的会，做了宣傳，把他們那些‘合作吃干飯哪’‘单干吃白面哪’，这些謬論都給轟回去了。如今把他們牵回去的驢子都牵回了

社，有的一看风头不对自动送回来了。现在剩了一个超额投资问题没有解决，他们还不高兴。支部和管委会研究，乡党委也同意，决定归还一部分，从经济上缓和缓和；今晚准备召集有关户开这个会呢。”说到这里，他向外屋喊了一声：“素英，饭熟了吗？”

“饭熟是熟了，就想不出办法弄点菜。”素英在外屋说。

“咱不是还有两棵白菜吗？再不吃就光剩两根菜筋了。”说着，他走出去在灶火口上用俩砖支架起一个砂锅：

“你切菜，我看火，咱们快一点；吃了饭我还得快忙去地里。”

“哎，下午不是你答应磨会见面吗？我得带妇女们去浇稀。我不去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子更不愿干了；都嫌那活脏。”白大嫂一边切着菜一边诉说着。

“磨面不忙，社里牲口正忙着耕地，吃饭先凑合着点吧。”说着，他往砂锅里滴上了两滴油。

“不磨就没得吃了，棒子又不能囫圇着下锅。”

“我想个办法吧，到晚上下地回来，咱们人推两遭。把棒子破开就吃，在东北净这样吃，这叫苞米渣子饭。好不好？”他扭回头来瞧了瞧她。

白大嫂看了我一眼，向丈夫示意：有客怎能行呢？

“呵，不要紧，自己的同志有什么关系。不信咱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一定同意我说的。”

我急忙表示态度：“方玉说得对，大嫂可别当客待我。你把推磨的事交给我和他，下晚保证完成。”

大嫂满意的然而又不大好意思地向我笑了。里边也包含着谢意。

白方玉只顾说话，锅下边的火熄灭了。他即刻伏在地

上，口对着底火吹了又吹，仍是不着。冒出的濃烟呛得他紅漲着臉大声咳嗽起来。

“哎呀，我的县大老爷；讓我来吧。”刻下她真不拿我当外人了，竟当着我这样玩笑着說。說过之后，她倒有点不自然起来：“嘿嘿，我是說回到家来什么也得做……”

“这就是为人民服务嘛，人民需要我坐在办公室里的時候，我就規規矩矩坐在办公室；人民需要我种庄稼、办社，咱就种庄稼、办社。伏在地下吹吹火，对人又小了多少呢。”白方玉也兴高采烈起来。

白大嫂把那几根棒子秸抽出来，放在地下用脚踏批，然后再填进去那火很快就着了。白方玉看着人家是比自己高明，喃喃地說：“又学习了一手。”

应当說，他們家的午飯是由于我的打搅才拖晚的。这时許多人家都吃了午飯，有的人因事找上他来。在农村，不是飯时来堵，大概別的时候社主任是不大容易找到的。就是剛才悄悄走来的那个青年妇女，来到后又是什么也不說，呆呆地坐在那里漫无目的的看着墙上过春节时貼的花花綠綠的年画。

第二个来找的是白永銀。他一进大門就喊“白白白……”直到屋里才把“白方玉”三个字喊出来。这个人的白齿实在不够理想，据說內里的心眼兒却是一兜兒，但好的也是不多的。白永銀有个哥哥叫白永金，那才是个老老实实的人。当初他們兄弟两个人分家时，給老母亲挑出十亩“养老地”。按通常习惯，“养老地”兄弟分种，老母亲的生活二人分担。可是白永銀貪饞那十亩上流地，就天天給母亲做点小鍋飯哪，說几句好听的話哪哄住了母亲。他就給母亲出主意：讓她把哥哥分种的那五亩养老地抽回来，完全交給他种。白永

銀答应下哥哥：自己情愿把老母晚年的生活費用全部負擔下来。可是这事情办妥以后，文書也立了，他对母亲的态度变了。吃、穿不单不另眼高待，甚至还低于他的老婆孩子：一条棉褲讓老人連穿三冬也不給拆洗，只嫌老人飯量減得慢。他的日子却不断富足起来，光算摸着置上个五亩六亩的呢。高級化以后，取消了土地分紅，一个人觉着养活母亲实在不上算，就开始每天找一次干部。每天到来，說話的内容和姿勢都是一样的——进屋倚在隔山牆門扇上，两臂抱起肩、歪着头又有点結巴着說：

“方玉爷們兒，咱們的事兒办办……办得怎么样啊？”臉上是在造作出来的、令人看了极不舒服的微笑。

“你这事情很难办。当初你和哥哥是立有字据的。”方玉說。

“当初可可……可沒講合作化呀？”永銀問。

“有利的事兒自个干，吃亏的事兒讓別人背，这样的便宜事兒說不过理去。”白方玉說。

“不是，爷兒們。老娘老了，还能孝順几年呢？我絕絕……絕不是嫌累贅，是那个不懂理的娘兒們天天和我吵嘴：‘两家的老娘为什么光讓一家养活！’你看看，为这事兒真真……真要打她几下子，又得說是‘欺压妇女’”。他慣于把一些不体面的事都推在“娘兒們”身上，又把自己說得在女人面前那样无能为力；其实是相反的。

白方玉听着这些謊話，心中好笑。他納悶地問着自己：“为什么这样的人說着謊話就一点兒也不紅臉呢？”他覺得有必要研究研究他們的灵魂。白方玉向他誠懇地說“叔叔，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你的日子几年来过的好，大驢子喂着这誰都知道；你哥哥那边过的巴結，孩子又多，差不多每年青

黃不接的時候都吃一次救濟，這你也知道。我看這事情，放幾年再說，等他的日子好起來。你們這事兒，好說。論分工，你的事應找村主任，我是管不着的。”

“噹，你是縣長，還還……還說‘管不着’，你什麼事兒過問不得？”他吹捧起來。

方玉從心眼里討厭他。他聽了白永銀的奉承話皺了皺眉，象咽湯藥一樣咽下那口飯去。

白永銀蘑菇了一會兒走了以後，早坐在那裡的那個悄悄走來的青年婦女仍坐在那裡，呆呆地過了一會兒就什麼也不說的走去了。她走了以後，我納悶地問方玉：

“這個婦女好像有事吧？”

“有事。”他點點頭，“她家生活有點困難，可那困難來的不光彩。所以她想向社里提，又不好意思。”接着他又向我介紹了問題的來龍去脈：她是白雙居的媳婦，是個懂事的和人要好的人。她家本來是自足戶，因為春節以後她丈夫盲目走了一趟蘭州，結果有了虧空。白雙居走以前，社里就知道了，勸他不要走，因為春天社里農活多，再說蘭州也不是去到就有工做。小伙子不聽，硬走了。走時把自己的口糧也賣掉了，又借了一二十元湊上了去時的路費。結果，現在回到村，糧食不夠吃，還欠下人家的債。

三

下午，我和白方玉一塊去地里，他原來看耕地和播種的情況的。走到村後的打谷場上，見一伙子人正在脫坯。年輕人都光了膀子，孩子們在那大大的土堆上張起了筋斗。由於受到他們的感染，我立刻覺得身上也熱得發癢，直到把棉祆脫掉才松快了一些。

一輛人拉的大車，从远远的村外赶来。白方玉告訴我，那是运的脱坯土。由于社里的牲畜都用在了耕耙地上，青年团员們自动提出这样做的。拉車的和脱坯的人到了一堆，場上立刻泛起快乐的說笑。白方玉告訴我，人們的生产情緒增高了。

“你回来以前是什么样的？”我問。

他笑一笑，不做正面地回答：“那时候农活也不如現在忙啊。”

我发现白方玉的談話中，极力避免把他回来以前和以后的情况做比較——他不愿意把自己回村办社說成是什么“轉折”。

后来我从支書那里才了解到已往白家村社里的情况：春节前后，那是比較混乱的一个阶段。一般社員虽說还是坚决依賴于社，但有那样十来戶中农，尤其是养驢子的、投資大的上中农，确实动搖了。他們只覺得自己的收入没有什么增加，沒有看到許多貧苦戶的收入有了普遍增加，就吵嚷“合作化沒有优越性”。这陣风也吹到一般社員的思想里来，大家一时認識不清也就有些摆动。那时，他們养驢子戶把驢子牵回去了；收社里的草、装社里的料，就不讓社里使活。社主任去說服，他們就要求退社，天天和社別着勁。那时社里也想不出什么新鮮办法来，社員干着活确实勁头不太大。到白方玉回村以后，很快被选上了社主任，首先在党支部和社管委会上研究了中农問題：决定首先召开一个上中农和村中有威望的老年人的座談会，誠誠懇懇的听他們的意見。这个会开得好，他們都把話說了出来，有一部分对我們工作的批評意見是对的，他代表社表示接受，并决心在今年的工作中改正。有一部分意見是錯的，那就是“合作社到底有沒有优

越性”的怀疑态度。对于这些錯的意見，当时他并没有馬上批判回去。他只是把自己态度和决心告訴了他們。用他自己的話說，那就是“头拱地也要把社办下去，而且还要办好”。把这些上中农的思想摸到以后，社里以各队为单位展开了討論。大家以今比往，具体算賬，举出了許多事实証明了“合作化的好处說不完”。党的、团的宣傳部門、小学教師也帮着把这些材料編成各种快板、順口溜、笑話等等，天天在黑板报上写。不多几天，怀疑論調被駁倒了，正气起来了，騾子又陸續牵回社来了。

也应当公平的承認，那些养騾子戶虽然受到了群众一定的压力，但思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同时他們更看到了白方玉回村办社，窺見了党对合作化那坚定不移的方針，这就把在他們脑子里冒出的一股鬼火扑灭了。有的說：“方玉回来了，再看他一年。”也有的說：“党把一个县长都給了我們，还要怎么着？只有好好地干下去，才能对得起毛主席。”

白方玉从領導这次斗争中，也看到了一般中农的心。他觉得他們不是坚决反对合作化，而是要求有不断增加的收入。去年的生产沒有滿足了他們，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合作化第一年，生产管理沒有經驗，劳动力組合不好——这是我們創辦合作社难免的缺点。再一个是：农作物种植上的命令主义和主觀主义以及非生产开支过大，这是不能要求社員原諒的錯誤。那些日子，白方玉无时无刻不在回忆着中农們給提的那些好的意見。晚上，长夜不眠，展轉思索，有时就把灯点上，翻查着記錄。他逐条逐句地喃喃讀着：

“河底下种棒子、黑土地种大片白薯，千古奇聞！”这是白汝江的話——他的筆記本上这样注着。

“冬天打井，那是多么热火呀！我活了多半輩子，哪見

过庄稼人这样卖力气。可是我們的好事办坏了，多可惜！这里打着井，一会儿一个情报：某某村完成了多少眼啦；某某社平均达到多少亩一眼井啦。‘我們追呀！’‘决不能落后呀！’这一来就光凑数、不管質量了。結果花錢不少、用工不少，打的井能用的不多。有的井淺的，飲飲牛就能打干。咱們想想：那些在冬天下到井里挖泥的人，把两腿几乎冻成了紅萝卜，他們事后看到这些廢井，寒心不寒心呢？这个怨誰，我看怨上級（不能这样說。应当說怨上級机关派来的那些有勇无謀的同志；也怨我們村里的领导干部掌握的不稳）。”他在白国峰的話后加上括弧，里边說明了自己的看法。

.....

白方玉在翻讀着这些記錄的时候，許多熟悉的声音在他耳朵里响着；他心里和这些声音不断地對話：“这些批評得我們对。”他看到不对头的意見，也并不冷笑，只是喃喃地解釋。他就这样一連熬过了几个通夜。孩子在他的身旁靜靜地睡了，惟一陪伴他的是她——素英。她簡直成了他的顧問。

“素英，白国章这几年日子过的怎么样？”他常常是一面思索着較为突然地向她提出問題。

“哦！他嗎，他前几年过的倒是富足点，因为有个大驢子，断不了出去跑跑。成高級社前一年，因盖那三間北屋盖的也够紧的了。去年一冬一夏，还没有見他家大人孩子做件新衣裳呢。”她慢言慢語地一面想着一面說。

“噢，要这样的話，把驢子入在社里，超額投資就該看情况还他一些了。”他自言自語地說着用紅笔划上了記号。

过去的那几天，白方玉的眼角熬得发了炎，牙齿也在輕

一陣重一陣地疼着，但他的精神却看不出一点兒疲倦。他与党的、社的干部一起研究解决了几个重要問題。一个是抓紧春耕、准备播种；一个是有领导地和社員一起做今年的种植計劃；再是飼养員选举。还没有做的最后一个分期归还超額投資問題，打算今天晚上召集有关戶專門开会商量。社員們对这几項工作反映很好，他們觉得能够当家做主了，积极性大有提高。

我和白方玉走到耕地的那里，正赶上他們撈歇。在地头上，牛搗着嚼，白汝年老汉用梳子給它正往下刮即将脫落的絨毛。白方玉見到这样的举动，心里自然十分高兴。他走过去說：“老叔，要都能象你这样爱护牲口，我們这些牛的皮毛也不致于这样难看。”

白汝年老汉，使人一見就觉得他是一个既有农活經驗又忠于社的老农民。他点了点头，很深沉地說：“方玉呀，养牲口全仗一个勤謹勁哪。”稍微停了一会，他又說：“你看，这头牛从惊蛰那一天就跟着我耕地；一个多月来，活不能說不累吧，不光沒有倒下，身上还显得活泛多了。这牛子，就怕乱抓乱使，不管不顧最不好。以后咱社里可要教育大家伙爱惜牲口呀，过日子这是頂要紧的。这几天我就睡不着覺了以后偷偷地想：有的人一心多挣工分，一天耕三四亩，牲口这样瘦弱能吃得住嗎？我的意見是，今春耕地每天超过二亩不多給工分。那也許就不赶着牲口玩命了。到时候了，該保护保护这些不会說話的宝贝疙瘩了。”老汉說着，心中涌起对那些不爱惜牲口的人的憤恨。

“你說的很好，老叔。我建議計劃股好好研究你的意見。”方玉感动地說。

白汝年平常是不大講話的，在社里总是低着头子不声不

响干活。今天他見社主任支持他的意見就又說：“我們这个耕地組，几个人早討論好了：春地保証耕完。还得讓牛胖起来。大侄子，不信你看，我們真有这个雄心哩。”老汉愈加兴奋起来。

白方玉信任地点点头。老汉又指着那边的一头牛說：

“你看我們是怎样对待老牛的。我們特別照顧它，下地前双居还給它带来的‘点心’。”白汝年老汉說着把我們帶到独自享用“点心”的老牛那边去：“牛老了和人老了是一样的——牙口沒有年輕的那樣得勁了。它們要是喂一般大的工夫，口輕的吃得飽，那老的就得餓着肚子，这要一齐拉出来下地是不行的。”

蹲在草筐籬前边的那位年輕人，在那里正仔細地給吃着草的老牛往外拣粗而且硬的草节子。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那个悄悄走来的青年妇女的丈夫——白双居。

白双居是沉默的。他見白方玉和我走过去，仍然低着头工作。不用說“盲目走兰州”的事对他是有丁教訓的。

在回村的路上，白方玉还向我介紹了他們之間的一段故事：

白方玉从故城县退职回来，走到德县上火車；白双居从兰州回来，也在德县換車，他們两人在候車室遇見了。那时的白双居可不是这样踏实，穿着一身藍中山服，脚上是中华牌的新球鞋，在候車室大搖大摆的；他遇上白方玉有些意外了。因为他是他的堂叔伯伯，他知道他不喜歡一个人故意把自己装扮成脫离自己本色的另一个样子。

白方玉覺得在这里遇上他有些奇怪，就問他做什么去了。不問还好，这一問可把白双居的牢騷勾出来了。白双居說：“去了一趟兰州，沒有找到工作，政府开免票把我們送